



赵建：中国进入民生经济时代，共同富裕要分三步走（ 改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本文首发于 8 月 23 日，此为整
改版。



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迈进。与第一个目标“快速做大蛋糕”相比，第二个目标“公平分配蛋糕”可能更加重要，又更加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稍有不慎，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和激化，不仅不会改善收入和财富结构，反而让第一阶段的成果付之东流——历史无数次共富的经验，成功的案例很少，反而大多数时候走向了反面——富的不再富了，但是穷的更穷，结构的改善以总量的衰退为代价，所谓的索维尔陷阱。这来自历史深处的昭示，让规划者不得不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以及更富有使命的肃穆、神圣与紧迫感。

好在，与过去简单的“盐铁税”和“青苗法”相比，现在有了更多科学的现代治理方法。

共同富裕让时代的聚光灯从过去的“先富”，转向现在的“后富”，以回到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初心。不可避免又意志驱使的，中国进入了“民生经济”时代，即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和市场逻辑主线的时代。这同时意味着，它也将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握手，黑猫白猫、先富后富时代，与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扶贫攻坚与高质量发展时代之间在传承、冲突与最终融汇中大激荡的时代。在这个过渡阶段，政策的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顶层设计者正从时代的高处俯瞰历史的蜿蜒脉络、理想的崇高伟大与现实的坑坑洼洼。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每一次政策的选择都是对过去的扬弃和取舍，对未来的坚持和承诺。而如果只站在利用物质利益激励要素积极性的过去，或站在私我利益最大化的西方自由经济学视角，则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转换河段的蜿蜒崎岖和水流湍急。对于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险峻，数字平台的垄断资本恐怕早有体验，但这不过仅仅是开始。

如果沿着“历史三峡”的宏大假说，这一次重大的发展道路切换可以说是三峡中的最险峻之河段，是发展经济学的一次重大理论范式革命和现实政策实验。再次运用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模型，一个发展经济体能够点燃引擎跃然而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能够平稳着陆演进为一种成熟的现代社会则可能更为关键，这关系到能否进入一种不再集体焦虑的“温和

与平静”，或者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艳羡的“走向丹麦”（社会福利国家的典范）。在这个理想的状态中，不再需要用增量扩张弥补存量分配的难题，不再需要用过度消耗资源和债务的高速度，替代需要结构优化和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在这个状态中，政府、市场、社会再次找到合适的角色以“保住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而对于这一切，更加注重如何增长和追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既缺乏重视，又知之甚少。中国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像发展市场经济一样发展民生经济，解决贫富差距、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以像创造经济起飞的“中国奇迹 1.0”一样，创造民生主导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奇迹 2.0”，这或许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含义。

正文逻辑

一、历史重温：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民生和社会福祉才是最终目的

二、模式切换：从分配性努力到生产性努力，再到分配性努力

三、走向丹麦：从苏联模式、美国模式，到丹麦模式，构建成熟的现代福利社会

一、历史重温：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民生和社会福祉才是最终目的

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是一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启蒙运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推进，在于邓小平的一段话解开了人们心中的枷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种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在手段上，而是在目的上，是不是真心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生问题或大多数人的福祉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究竟采用计划模式还是市场模式，都是一种手段。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否则就会犯历史错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借鉴苏联模式采用计划经济，虽然组织了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也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的代价。这显然就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用丢失社会主义目标的代价即人民群众生活普遍贫困、生活生产物资普遍缺乏的代价，来痛苦的坚持本来作为工具的计划经济。这显然犯了手段和目的异化的哲学错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这样的错误也已经出现，即把原本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市场经济当做了终极的目的，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心，即事关大多数人的民生问题。若单纯以市场经济为目的，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润，则很容易忽视普通员工的 996 压力和低收入焦虑，他们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若单纯以市场经济发展为目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的是如何招商引资和投资兴建“面子工程”，对关系到医疗、教育、城市防灾能力等“里子工程”则缺乏积极性。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十八大确立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对市场经济这

一手段的高度肯定。市场经济的优点是能够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是一种去中心化、分布式的资源配置模式。它充分调动了田间地头、大街小巷、车间厂房的无数个看似卑微但汇聚在一起又无比伟大的无形力量。可以说，市场经济才是能够真正调动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它实现了供需关系的坐标系转换，将需求放到了第一位，并通过价格的信息指引实现供需均衡。计划经济则是以供给为主导的中心化决策体制，少数人组成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供给的量价清单，全然不顾社会中的需求，因此很容易导致结构性短缺。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来说，作为手段的市场和计划都不是万能的。过去施行的计划经济缺陷问题已经被事实证明，但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是完全无效的，尤其是在当前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边际成本大幅衰减的时代，计划经济处理信息问题的成本大幅降低，顶层设计者施行计划调控的基础设施更好了。同样，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是万能的，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国内外的现实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宏观信息处理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非常尊重个体创造能力及独立决策的机制，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的人本主义，但对配套设施的要求也很高。可以说，真正完美的市场经济，是既精致，又脆弱的。大部分现实中运行的市场经济，很容易表现出集体非理性、两极分化、合法性套利、盲目生产和消费，以及对社会问题、生态环保等公共物品严重供给不足等问题。

因此站在这个目的一工具二元论视角，如果缺失目的或迷失了初心，把原本作为手段的计划和市场当做了目的，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危机，改革开放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付出的各种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债务膨胀、房价泡沫等问题。实际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已经造成了中国的一次非典型危机——事关民生的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学区房泡沫可看做是公共品供给不足引发的恶性通胀）。这个重大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市场经济层面所能解决的了。

二、模式切换：从分配性努力到生产性努力，再到分配性努力

如果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视角，将宏观活动分为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类，那么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起飞，必然意味着生产性努力总量和占比的大幅提高，生产性努力是人们共同发力一起做大蛋糕的过程，是用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思路。而分配性努力则不同，从贬义的视角来看它是指，不是一起想办法如何做大蛋糕，而是蛋糕还未做大就把如何分配放到第一位，是一种基于内卷和存量博弈的寻租和制度套利活动。分配性努力培养出了一批食利阶层，当这个阶层占比越来越高，负责生产性努力的群体不足以维系这个耗散体系的时候，社会治理的范式转换就开始了。

在分配性努力占主导的经济体中，事关分配而非生产的权力最为重要，这就会形成不利于发展的一种激励体系，即激励人们去通过各种非生产性活动来获得权力，从而占据分配性权力链条的有利位置。在这样的分配性

努力社会里，围绕权力博弈的政治动荡甚至是军事动荡最为常见，此时围绕发展构建的国家体系失败，从而也就失去了激励生产性努力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当每个人都发现辛辛苦苦的生产性努力不如钻营权力的分配性努力时，一种典型的“政治衰退—国家失序—经济衰落”的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最终社会形态甚至会收敛到无序的丛林状态——军政府出现，枪杆子下面出政权。一些国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种状态。

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当后发展经济体的要素红利和制度激励空间逐渐消耗完毕，生产性努力必须要公平的分配才能进一步激发的时候，分配的问题就要放到第一位。此时，公平与效率不是互斥的、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共生的，公平成为了一种效率，一种更有利于长期价值创造和社会环境稳定的制度基础。此时，我们对分配性努力的定义和认知也应该发生变化，分配是为了更好的激发生产性努力。这个分配性努力，不同于上面带有贬义的定义，而是存在于正向的话语体系和思想内涵里了。这个旨在激发生产性努力的分配体系，是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成为解决新的主要矛盾的一把钥匙，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节奏。也就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76

